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錚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Zhong Guo Jin Dai Xue Shu Ming Zhu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劉師培 著

李妙根 編 朱維錚 校

中西書局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鈞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劉師培 著

李妙根 編 朱維鈞 校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 劉師培著;李妙根編;朱維
錚校. —上海:中西書局, 2012. 6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 錢鍾書主編 朱維錚執行主編)
ISBN 978 - 7 - 5475 - 0293 - 8

I. ①劉… II. ①劉… ②李… ③朱… III. ①劉師培—
文集 IV. ①C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55230 號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劉師培 著 李妙根 編 朱維錚 校

責任編輯 張 榮 李碧妍

特約編審 李國平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上海文藝出版(集團)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經 銷 各地 新華書店

印 刷 浙江雲廣印業有限公司

開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張 15.2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 7 - 5475 - 0293 - 8/C · 003

定 價 45.00 元

重版前言

朱維鈺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十冊，於一九九八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為繁體字直排本。現在重版，改由上海中西書局刊行簡體字橫排本。

當年由我撰寫的初版編者說明，關於編纂過程，交代如下：“這套選編，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鈺組織實施。”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過程從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凡十年，其中必有曲折。我的陳述沒有虛語，但說得太簡單，刊出後未免引出猜測和議論。

起初有種議論，以為錢鍾書先生不可能同意任叢書主編。事實呢？一九八八年早春，我應邀赴北美兩所大學承乏客座教席，途經香港，與正在振興香港三聯書店學術出版業務的董秀玉總經理兼總編輯，商討她年前的一個提議，要我主編一套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名著的叢書。她同意我用五年編成晚清編三十種的設想，隨即由我以主編身份，與香港三聯簽訂了出版第一輯十種的合同。這時董總又提出，為利於叢書在兩岸三地發行，可請錢鍾書先生出任叢書顧問。

沒想到不久董總即告知，她專程赴京，將我起草的晚清編計劃面請錢先生審閱，錢先生很感興趣，並當場刪去原擬選陳熾《庸書》一種。

我和錢先生素昧平生，此前在復旦大學曾兩度受命籌辦中國文化的

學術研討會，均委托友人代邀錢先生出席，他均未蒞臨，而我仍將所編《中國文化》及國際討論會文集寄請他過目。或因此，他對我稍有了解，當董秀玉女士請他擔任我主編的《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顧問時，竟慨然允諾。這使我很感動，雖在海外輾轉數校，仍不斷以函電敦請有關專家分擔首輯十種的整理校點，自己也編纂較難的幾種。

事情往往出乎逆料。大概在一九八八年初冬某日，董總致電給我，說是日前錢先生對記者發表談話，內謂他已破例同意擔任香港三聯將出版的近代學術名著叢書的“主編”。董總深感署名處理為難。我以為錢先生可能記憶偶誤，却對叢書在海內外被讀者接受有利；至於我的署名無所謂。問題是合同已規定主編應對編纂的稿件負責審定，并撰寫每一種的學術性導言，這對年已七十八歲的錢先生可能有困難。其後商定，有關責任仍由我履行。

豈知事情的變化更出意外。我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從德國轉道香港回滬，董總謂叢書校點稿排印很快，要求我即寫導言，以便陸續出版。不料僅過月余，便發生那場風波，影響所及，香港三聯書店也改組。新調任的總經理和總編輯，都表示承認已簽合約，但對我相繼交付的書稿，包括每種的學術性導言，則於收到後預付合約規定的稿酬外，便擱置不予出版，理由是香港市場小，學術性書籍賣不掉。

怎麼辦呢？合約未改，我仍算主編，而我在學校勉強恢復教學秩序之后，除了帶研究生，便全力逐篇從事導言的撰著。董秀玉女士已回北京三聯書店任總經理兼總編輯。她關心叢書的出版，港方却答以等我將十篇導言交齊再議。她建議我將已改定的導言，徑寄錢先生審閱。我依言寄出擬列為十種首篇的《漢學師承記》導言稿，不久即得錢先生委托楊絳先生代筆的復函，大意謂收到我的“大作”，將留下“學習”云。那信息很清楚，不否認也不承認自己與叢書編纂的關係。這使我想起他為臺

灣版《錢著七種》所寫的前言，內將他的作品在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中的遭遇，稱作“表示風向的一片樹葉”（《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八版），現在是否表明他還要看一看叢書的命運呢？其時約在一九九二年夏季，錢先生已逾八十，風聞他和楊先生都身體欠安。於是我函告董總，表示不再以書稿事打攪錢先生。這是我與錢先生僅有的一次書面通訊，當然此後也無緣識荆。

鑒於我早將十種書稿交齊，香港三聯當局仍遲遲不予刊行，因而董秀玉女士遂通過購買版權，將十種改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於是叢書晚清編歷經八年磨難，總算提上問世日程。不知董總怎樣說服了錢鍾書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學術名著》，仍署錢鍾書主編，而我則著作執行主編。奇怪的還有香港三聯當局，他們以高價將叢書版權售予北京三聯書店，却又附帶條件，須將書版交給香港三聯，另換封面印港版五百部，就是他們估算的叢書在港臺的銷量。我對這種“生意經”感到寒心，從此不敢和這班人打交道。

叢書出版後，有位“錢學家”寫信命我提供與錢先生的交往情形。我如實答以沒有直接交往。豈知此君即作長文痛罵我學識淺陋，所編叢書十種均為劣質品云云。我不得作文說明叢書編纂實相，建議這位圖書館學者，最好不憑臆測追究他人動機。此后被人稱作專寫“容安館毀人錄”的這位作者，便視我為仇敵，在所謂揭秘的“大字報”中，會莫名其妙地扯上我，罵我將叢書編壞了，却又不說壞在何處，可謂深悉誣人三昧。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初版三千五百套，早已售罄。十多年來，多有朋友建議重印。錢鍾書先生早已逝世。董秀玉女士也已退休多年。我於近年身罹沉疴，於是同意上海中西書局，接受李國平先生的建議，用簡體字橫排重版印行。

重版必須重校。好在當年參與整理點校的諸位學者，如今均成人文學科不同領域的專家。他們都為承擔的成書的重校盡力。李國平先生還關注重版本的編輯發行。當初我撰寫的十篇導言，出版後曾得讀者商榷，現在除敘事數處略有修正外，餘均依舊，至盼讀者繼續指正。

重排本署名，均依初版，以保存那段曲折歷史。當然，仍須申明，全書由我設計體例，選定版本，通審校點，撰寫導言，如有訛誤不當，均應由我負責。

2011年11月28日三改

*其中《廬書 初刻本 重訂本》、《劉師培辛亥前文選》為繁體字橫排本。

編者說明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的晚清編，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

遴選的學者和論著，着眼於學說有新意，有己見，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

結集則不拘一格，以專題為主，每種或收一人一書，或輯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

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選擇底本，取原校較精的刊本；異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復核引文，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重施標點，包括分段；編制索引，分人名、書名兩類。

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附於篇前。導言既重可讀性，以助讀者了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也重學術性，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為行文簡明，諸導言凡引證出處、考訂史實或商榷疑義，均以附注形式陳述。

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晚清編擬分輯刊行，初定每輯十種，先成先印。如可按設想出齊，當能略見系統性。

這套選編，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錚組織實施。

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由於種種緣故，長期不克面世。現由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

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同時期待高明指正。

編例

一、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

底本。以原刊爲主，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誤，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并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一般不作理校。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以脚注形式見於同頁。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於正文不作改動。

節錄。於篇題下注明，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

標點。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概施以新式標點。

分段。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讀者。

注釋。作者原注概從原刊。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訛誤，以脚注出之。

譯名。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并有訛誤，則由編者徑予改正。爲方便閱讀，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

版式。概用繁體字，橫排式。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均改爲通行繁體字。原作或有雙行夾注，現均改爲單行夾注。

索引。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書名兩種索引，以便通檢。

二、本叢書所選諸種，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予以保留，并移作附錄。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導言

朱維鈞

壹

誰曾留心清末民初的政治史學術史，誰就不會不注意劉師培。

確實的，此人的一生很短，死時才三十六歲，現身於思想文化界的時間更短，不過十六七年，却無論在學林，或者在政壇，都留下了一串脚印。而且，略窺那串脚印，便會發現，屬於純學術的一行，特色是“不變”，而屬於藉學論政的另一行，特色則是“善變”，並且是倒行式的變化。二者的反差如此分明，令人不禁以為此人的兩足，踵尖位置似乎生來是互倒的，因而在各走各的路。

譬喻終究是譬喻。事實上，以往海內外關於劉師培的研究，更多注意的是他藉學論政的一面，在政治上善變的一面^[1]。存在着“以人廢言”的取向，這在海內有關討論中尤為明顯^[2]。

但由歷史所昭示，劉師培的短暫一生，是奇特的。學界的巨子，政壇的浪子，既得聰明益，又被聰明誤，況且還有位行為同樣奇特的妻子，如此錯綜的矛盾集於一身的人物，在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史上，雖然不算絕無僅有，却可說是那個時代某一類型的學者化身。

不待說，這樣的人物，值得研究，也應該研究。劉師培生前曾自編《左盦文集》，僅五卷，而且不收辛亥革命前的激烈論政的文字，既太簡，又片面。他身後蕭條，遺著散落。經錢玄同多年搜集，於一九三六年即

劉師培去世後十七年，編成《劉申叔先生遺書》，輯存他的已刊未刊的論著凡七十四種。劉師培的大部分著作，賴以保存。但這部《遺書》，既有遺漏，還有隱諱。譬如劉師培在晚清所辦的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天義報》及其後身《衡報》，內有多篇文章，在《遺書》中便被刊落。據初步統計，《遺書》未收的劉師培詩文，約有一百多篇。^[3]

研究需要資料。豈止當年發表劉師培論著的報刊，在國內收藏單位都多半視若拱璧，即使五十五年前刊印的《劉申叔先生遺書》，也為讀者所罕覲，儘管當初校勘尚欠精審。目前還缺乏重新輯校出版劉師培“全集”的條件。但作為研究晚清學術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個案，一部較全面地展示劉師培在晚清論學論政概貌的選集，則更適合讀者的需要。

貳

劉師培，字申叔，曾更名光漢，號左龕，一八八四年五月生於江蘇儀徵。^[4]

儀徵劉氏是晚清有名的經學世家。劉師培的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以三世相續，共注一部《春秋左氏傳》^[5]，而著稱學林。父貴曾早逝，由母李氏給他啟蒙。他自幼便顯示具有超常智力，經書過目成誦，八歲就能解《周易》變卦法。由於劉氏三代都功名蹭蹬，因而他被父輩寄予過大的期望，是很自然的。^[6]

劉師培似乎不負所望。一九〇一年補縣學生員，次年應江南鄉試，便中了第三名舉人。現存清代光緒壬寅科江南鄉試檔案，記錄他那年十八歲，可謂少年得意。但沒料到世道變了。就在一九〇二年，被八國聯軍驅趕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偕同光緒皇帝“回鑾”北京，迫於內外形勢，表示要改行“新政”，首先被提出的便是廢除科舉制度。劉師培敏感到中

進士入翰林的清夢，快被打斷了，沮喪之極。這由他兩年後仍哀嘆“飛騰無術儒冠誤”〔7〕，可以作證。

由於家貧，也由於心情沮喪，劉師培在一九〇三年初跟隨友人到了上海，顯然想在“十里夷場”碰碰運氣。豈知不過月餘，他就發表《留別揚州人士書》〔8〕，宣佈他決心“排滿”了。

劉師培的政見突變，這是頭一回。正像以後多次突變一樣，驟然從一極跳到另一極，令人很難尋繹他思路的由來。例如這回突變，馮自由以為，乃是他“少讀東華錄，夙具民族思想，尤佩仰章太炎學術”的緣故〔9〕。前說無佐證，後說似有可能。但他佩服章太炎，恐怕不僅由於論學臭味相投，而且由於迅即被章氏的排滿論所折服。

一九〇三年夏季“《蘇報》案”發生，章太炎和鄒容，在愛國青年的眼中，成了為革命受難的英雄象徵。他們的行為，怎樣使得劉師培傾倒，由他在這一年發表的三部著作可證。《中國民族志》集中闡述“光復漢族”的見解，《中國民約精義》直接呼號民權自由。兩書都署名“光漢子”。而更直白清廷應作為夷狄攘除的《攘書》，索更號為名，署姓名為“劉光漢”。總之，從見解到用名，處處表現以闡發《序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思想為己任。〔10〕誰都知道，清政府向上海租界當局控告章太炎、鄒容“叛逆”，正是以章太炎的這兩篇名文當作主要罪證。

這三部著作也使虛齡才二十歲的劉師培名聲大噪。尤其是他模擬盧梭，亟論中國需要“天賦權”的《中國民約精義》，更受同代知識青年的歡迎，有人甚至作詩恭維他是“東亞盧騷”〔11〕。

一九〇三年冬蔡元培、葉瀚等發起“對俄同志會”，出版《俄事警聞》〔12〕。劉師培成為它的積極成員，撰文揭露沙俄侵吞中國領土的陰謀，藉以抨擊清帝國的內外政策。一九〇四年二月日本和沙俄竟在中國的東北大打出手，《俄事警聞》改組為《警鐘日報》。劉師培又和林獬等

共同擔任主筆^[13]。同年又相繼參加蔡元培等主持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並成爲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組建的光復會的首批成員。^[14]

這期間，劉師培論政論學都相當活躍。在《蘇報》被封禁後，相繼出版的《國民日日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中國白話報》，乃至《覺民》等，都刊有劉師培的文章。他的文風也愈來愈肆無忌憚，甚至署名爲“激烈派第一人”^[15]。

叁

然而劉師培也沒有忘情於他的“家學”。當初章太炎與他一見如故，也因爲發現儀徵劉氏的這位第四代，經學造詣已堪稱其“家學”的傳人。

本世紀初的上海，真是個魚龍雜居的“海”。講革命的講復古的，講進化論的講特創論的，講孔孟道統的講文化西來的，都能在這裏覓取知音。一九〇四年末出現了“國學保存會”，發起人鄧實、黃節，都來自廣東順德。次年二月開始刊行《國粹學報》，總纂鄧實，而擁戴尚在獄中的章太炎做盟主。^[16]

《國粹學報》的名實並不相符。豈止“國粹”一辭是從日本輸入的^[17]，就是它存在七年間貫串八十二期^[18]的一個基調，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也屬於舶來品，從十九世紀晚期法國漢學家拉庫伯里那裏販來的^[19]。但它揭出宗旨在於“爭科學”，講歷史，使中國文化不致成爲清帝國“種族專制”的陪葬，則對政治取向很不相同的學者名流，都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曾爲它撰稿的知名人士，在半百以上。然而它的主要台柱，却是劉師培。

自《國粹學報》創刊號發表劉師培的《讀左劄記》，到它於一九一二

年宣佈“滿清退位，漢德中興”而終刊，劉師培論著出現其中者，有八十年，就是說僅有兩期沒出現他的姓名或筆名。^[20]而論著數量，也多達五十餘種。可以說，他的論學文字，大半見於《國粹學報》。難怪有種誤說，竟以為此刊是劉師培與鄧實“創辦”的^[21]。

還在一九〇三年七月，劉師培便首倡“黃帝紀年”，既否定君主年號，又否定孔子紀年，而後者正是康、梁保皇主張的一種掩飾。因而很快被“排滿革命”論者普遍接受^[22]。喚醒國民的“黃帝魂”，也從此為革命者所樂道。

但劉師培又走得太遠了。所謂古巴比倫是世界文明共同發源地的說法，本來就是一種假設，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更在司馬遷時代便是難題。拉庫伯里糅合假設與傳說，斷言黃帝是古巴比倫一族酋長，率眾東遷到中國，驅逐了原居民苗人，從而成為華夏族的鼻祖。這在學術上原屬推論，而且很像歐洲白人移民“新大陸”後對付印第安人的故事新編。雖然首先相信的並非劉師培，作文宣傳的也不僅是劉師培。但從《中國民族志》、《攘書》，直到《國粹學報》所刊載的《國土原始論》、《華夏篇》等，引經據典，考證日煩，力證漢族古文明與西方文明同源，則是劉師培的突出之處。

除了論證中國文化西來說，其學術意義頗多可疑外，劉師培在晚清的學術論著，固然時時流露學派的成見，例如論今文古文，則頌古非今，尤其不滿魏源、康有為的所謂今文經學，例如說漢學宋學，則尊漢抑宋，尤其好斥湯斌、李光地等所謂理學名臣。但相形之下，他的學術成見不比章太炎更多，而遠較他們的共同論敵康有為遜色。

譬如說《讀左劄記》。劉師培把這組短論供給《國粹學報》創刊號，無疑有炫示“家學”真傳的意向。內容呢？八則劄記，都集矢於“區別夷夏”，非但不像他的先輩那樣，對《左傳》的每事每言，都力求搜索出與

公、穀二傳的異點，反而設法證明《春秋》三傳的同點，並說同點就在三傳都是“種族之學”。這是在破門戶，哪是在守家學？

實際上，不但劉師培，而且康有為、章太炎，都已不是甚麼經學家。在歷史上，經漢學也罷，經宋學也罷，或者今文古文，朱學王學，都屬於中世紀統治學說的某種形態。就這個意義來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清代漢學，以及龔自珍以後的清代公羊學，都已經脫出中世紀經學的常軌。至於康、章或劉師培，在清末從事的學術活動，更分明是在給中世紀統治學說掘墓。他們自稱是相信董仲舒，還是相信劉歆，並不能改變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實。^[23]

肆

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鐘日報》被上海有關當局封禁^[24]。劉師培不得不避地他去，先匿居浙江平湖，繼赴蕪湖，化名“金少甫”，先後任教於安徽公學、皖江中學等，將近兩年^[25]。這期間，他曾參加陳獨秀等發起的岳王會。但除教書外，顯然有更多時間從事讀書寫作，因為這期間他的學術論著最多。

《劉申叔先生遺書》收有多部題作“教科書”的著作，譬如《經學教科書》、《倫理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地理教科書》等，不待說都是為教書而編的講義。教科書須兼顧知識性、系統性，要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加以身處秘密狀態必需的審慎，因而這類著作，雖然都顯示作者力求以新式教科書為模式，使結構和內容，都有別於八股式的高頭講章，見解却都比較平和，罕有激烈的議論。同樣，這時期他發表的另一一些論著，如《國學發微》、《孔學真論》、《古政原論》、《理學字義通釋》等等，學術氣息較強，但看其陳述形式，也令人感到原是講義。

不過，單看以上名目，便可想見那兩年的劉師培，不論出於主動還是被動，在學術上涉獵的方面多麼寬泛。貫串古今，溝通中西，這樣的嘗試當然使年輕的劉師培獲益匪淺。無怪乎一九〇五年後，他多次宣佈應做“通儒”，而不顧可能辱及先人，鄙斥道“僅通一經、恪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26〕

這期間劉師培的學術視野，看來較集中的有三方面，即周秦諸子學、清代學術史和古典文論。

諸子學研究，從十八世紀末起，便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對揚州學派的學者，劉師培首先欽佩汪中，便因為汪中是清代漢學的諸子學研究先驅。但到本世紀初，“復興諸子學”，已被賦予新的意義。那就是希望它可能成為在中國開展一場意大利式文藝復興運動的前奏。文藝復興，鄧實稱作“古學復興”〔27〕，章太炎稱作“文學復古”〔28〕。在《國粹學報》創刊號，劉師培便含蓄地表示，他們很想在中國步當年但丁的後塵〔29〕。以光大諸子學來貶斥孔學，至少是《國粹學報》主要成員的共識。但劉師培到底受“家學”的限制，對諸子學沒有甚麼特見。他所做的，主要是儒家諸子的研究，乃至將西漢經學家都列為諸子一類，手法類似當年康有為；他特別強調“古學出於史官”〔30〕，又是遠祖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近承章太炎的“諸子出於王官”說〔31〕。

古典文論研究，是劉師培的得意方面。《國粹學報》創刊起，便不斷刊載他的這類論著。但他在理論上，從未跳出阮元“文筆辨”的窠臼。倘說有貢獻的話，那就是他不斷從歷史實例和文字音韻兩個側面，論證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之主張的合理性〔32〕。另外，就是除“俗文”外，論著大都散發着濃烈的駢儷文氣息，用實踐來表現他對揚州學派另一位先輩的欽佩。在桐城派仍在文壇有相當影響的當時，劉師培的做法不能說沒有意義，也可以部分解釋他為甚麼愛同嚴復作對。但這使他的